

■ 红星照耀中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他16岁就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鬼子追杀，他躲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老大娘把他藏到喂牛的大石槽里，盖些草。

敌人搜查到这里，一进门就把老大娘用刺刀捅死了。鬼子没发现他，他逃过一劫……

陈广诚：身经百战，弹片“长”脑中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高磊
本报通讯员 吴健

1921年10月1日，陈广诚出生于汶上县。巧合的是，他出生的年份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他的生日又恰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庆节。也许，他的一生从出生起便与革命结缘。

陈广诚兄弟姐妹5个，家里非常贫穷，经常吃不饱饭。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他们逃荒，一路讨饭到了河北石家庄。陈广诚听当地村民说，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当时红军已到陕北，为了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血气方刚的陈广诚就和当地一个叫沙子义的人一同参加了红军，那是1937年3月。

今年5月31日上午，在淅沥的小雨中，记者到汶上拜访了老红军陈广诚。95岁高龄的陈广诚正和老伴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见到有人来，老人微笑示意。2000年春节，陈广诚在饭桌上给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革命往事，大儿子陈建军作了记录。没想到，2014年老人因脑梗失语了。虽然意识清晰，但吐字模糊。这份记录也成为我们了解老红军陈广诚那段光荣而艰险的战斗经历的珍贵资料。

个头矮小差点没能参军

陈广诚参军那年才16岁，因为长期饥饿，瘦得皮包骨头，个头矮小，最初部队嫌他太小。在陈广诚的强烈要求下，部队领导看到了他的决心和勇气，这才同意他参军。红军改编后，陈广诚是120师独立旅27团特务连的一名战士。参军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部队由贺龙领导。由于个头小，陈广诚非常机智灵活，先是在部队里当通讯员，后来又成为警卫员。

陈广诚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表现出色，作战英勇，1938年3月，经连长王友道、指导员苗庆林介绍，陈广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让陈广诚印象最深刻的是百团大战。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大进攻。

据陈广诚早前回忆，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据点，炸碉堡，破坏铁路、桥梁，切断敌人的运输线。3个半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击毙打伤日军两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俘获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 红色记忆

陈耀贤是鲁南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他曾说：“一个人不能光为自己。为了自己去剥削人、压迫人是可耻的。”

天下的土地，本来就不是哪一个人的。世界上的人，不管穷人、富人都有了一份，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陈耀贤：“炼心成铁”闹革命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姜夫建

“直到今天，爷爷的下落仍然是个谜。”祖籍兰陵县磨山镇华岩寺村的陈一章感叹道。陈一章的爷爷陈耀贤，作为中国共产党鲁南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果这位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还活着，今年已是104岁高龄。“受爷爷影响，我们家族有8个人在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并相继入党。”陈一章说，爷爷一直没有走远……

逸劳忧乐意，未许别人知

“陈耀贤，字希堂，化名纪永才。1912年，他出生于今兰陵县磨山镇华岩寺村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兰陵县党史研究专家穆振昂介绍道。陈耀贤的父亲陈敬修，是光绪末年进士。1900年，49岁的陈敬修就任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知县。他任职近两年，以民事为念，民声甚著。卸任时，当地绅民送万民感戴六顶，德政匾五方。他在任时有绝句一首：“到任先戒酒，罢官方吟诗。逸劳忧乐意，未许别人知。”

1901年底，对时局无望的陈敬修辞官回原籍。回乡后，他勤于耕读，精研诗文，致力于发展家乡儒学，先建东学，再建后学，还在村西修建曾子庙，重修一贤书院。

1912年，61岁的陈敬修老来得子，陈耀贤成了他的掌上明珠。陈耀贤自幼聪明，记忆力过人。三四岁时，在其母纪氏的启蒙训导下，就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和一些简短的古诗，6岁进私塾。在磨山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陈耀贤童年时代的传说。在鲁南地区，“烟油”是指吸烟过程中产生的油，盖着“棉单”则是对床单的称呼，一般夏天睡觉时盖在身上。

一天，陈耀贤与爷爷在一起。爷爷坐在床边抽着旱烟袋，不料用力过猛把烟油抽到嘴里，连忙吐了出来。吐完后，爷爷随口说了一句：“烟好吃，油好吃，烟油不好吃。”陈耀贤听后，顺手从床上拿起棉单往身上一披，对爷爷说：“棉好穿，单好穿，棉单不好穿。”这一对一答令爷爷惊奇。

读私塾时，老师带同学去识读古碑。有的同学掏出纸笔抄录碑文，有的一遍遍念诵，还有的连声称赞碑刻文辞精美。然而，陈耀贤看过之后，却站在一旁含笑不语。

11天靠7斤小米赶到延安

1942年，陈广诚所在部队归属冀中军区，吕正操时任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参谋长是沙克。据陈广诚回忆，当时部队主要在河北、内蒙各地区与侵华日军作战。

当时，胡宗南所率的第34集团军屯兵西北，不断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到了秋季，陈广诚记得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他所在的部队独立旅奉命赶往陕北保卫延安。为了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他们不得不急行军。靠着7斤小米，部队以一天150里路的速度，历时11天赶到了延安。“还没到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部队就被胡宗南部给包围了，后来八路军第120师359旅给我们解了围，才甩开胡宗南部队继续前进。”陈广诚当时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

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延安之后，陈广诚说：“部队人很多，吃饭成了大问题，我们就开荒进行大生产运动。”1941年，由于日军疯狂进攻和“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陈建军表示，父亲在生活上一直非常俭朴，就因为当年饱受了饥饿的滋味，他清楚地明白一切都来之不易，需要珍惜。

为保护他老大娘牺牲

1944年底，陈广诚所在部队接到军委命令调到绥远地区，重归120师贺龙师长指挥，主要在集宁、绥远、丰台、桌子山、张家口等地区与日军作战。当时已经是警卫排排长的陈广诚，负责传递作战情报和作战命令，“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步步为营，建碉堡、挖战壕，甚至是一村一堡，一步一堡，当时的战斗非常惨烈。”

陈建军介绍：“整个八年抗战父亲都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不少于100场。”一方面，陈建军以父亲为骄傲；另一方面，又深感于今日幸福生活着实来之不易。“那时候咱们部队很穷，吃在农村，军工厂很少，没有鞋子，就穿老百姓纳的鞋，分1号、2号和3号。我父亲个子小，穿2号鞋有点大，打仗时不方便行军跑步，就只能穿3号鞋，双脚挤得严重变形。”说着，陈建军脱下了父亲的鞋袜，老人大概不愿意让我们看到，嘴里嘟囔着，双脚躲闪着，但记者还是看到了那双满是战争痕迹的脚。陈广诚老人的大脚趾大幅度地偏向内侧，和二趾三趾挤到



陈广诚旧照

了一起，不免让人心疼。我们无法想象，陈广诚就是靠着这样一双脚，坚强地走完了革命的路程。

抗日战争中，陈广诚差点丢了性命。“父亲跟我们讲过，在河北省，有一次他所在的一个团被日本鬼子三个联队包围了，对方有胜于咱们三四倍的兵力。任凭他们英勇反抗，也抵挡不住双方兵力上的悬殊。打了三天三夜之后，夜里部队开始撤退。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他跑到村里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躲起来，老大娘把他藏到门后边喂牛的大石槽里，弄了些草盖上。”可是没想到，日本鬼子还是搜查到了这里，一进门就把老大娘用刺刀捅死了。进屋找了一会儿没发现陈广诚，鬼子就走了。陈广诚这才逃过一劫，跑到村子的东南角和部队剩余人员会合。陈建军说：“父亲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流泪，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的命是老大娘的命换来的，是老百姓保护了他。”

弹片留在了脑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两方军队围绕受降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山西上党、塞北平绥等地，北上的国民党军队与当地或先到达的我军之间发生激战。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分由阳高、新平堡、兴和等地出动，对进占隆盛庄、丰镇、集宁等地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歼其一部。晋绥野战军从右玉、商都等地向凉城、陶林等地进攻。25日，于卓资山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26师4000余



陈广诚近照 陈巨慧 摄

人。10月底，两区部队对退守归绥的国民党军两万余人达成合围。至11月12日，五次击退敌人反扑，歼其3000余人。不幸的是，因为战斗惨烈，陈广诚在这次战役中头部和腿部均严重受伤。陈建军紧握着父亲的手，说道：“我父亲是二等甲级残废，现在头里还有弹片，已经长在里面了。前年生病住在济宁医院，检查的时候都不敢做磁共振，因为弹片会响。”说到这里，儿子的语气里充满了心疼。

1946年初，陈广诚到张家口养伤。1946年底伤愈后，马任兴旅长、钟胜义政委找他谈话：“经组织研究决定，让你去地方支持地方发展，你去内蒙古尚都县任县长吧。”可陈广诚却提出想回老家工作：“我已经十多年没回老家了，都不知道家里的人是生是死，想回去看看。”鉴于此，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一开始安排他回济北县当大队长，他再次拒绝。“虽然这些年在首长身边学了很多智慧和办法，但是我文化水平还是太低，那里地形又复杂，我刚从部队回来还不熟悉情况，到時候不能胜任，带来麻烦。”最终，他到了湖北区情报站当站长，主要负责济宁、梁山、汶上一带地下党、敌特、土匪以及地方活动情况，跟上级进行联络通报。后又任当时济宁湖北区的副区长。整个山东都解放后，陈广诚任苑村乡（今刘楼镇）乡长。

1949年，陈广诚在任期间又躲过一次死劫。据陈建军说：“那时候刚解放，土匪经常出没，尤其是湖区，比如蜀山湖、马山湖、南旺镇、刘楼镇那一带。有一天乡公所被土匪包

围了，杀死了6个人。那时候父亲有任务外出，命大躲过了袭击。”

1958年，国家开始成立人民公社，陈广诚被调到次邱公社工作。同年秋天，因为文化水平低，组织安排陈广诚去济南工业学校进修，学习文化和机械管理。1959年10月份又到德州参加省委组织部举办的又红又专大学，学期一年。

两年学习过后，正赶上1961年，党中央提出广大党员干部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陈广诚申请回乡务农。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公社党委书记找他谈话，组织安排他出去学习两年多，原本是对他的工作另有安排。谁愿意，陈广诚这次回乡之心依然坚决。他最终退职回乡，在汶上县刘楼镇陈村做了副书记、大队长。

陈建军讲述道：“父亲看见农村条件很艰苦很贫穷，特别是又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跟咱们‘要债’，陈村还经历了水灾，父亲就想让老百姓富起来。”于是，陈广诚带头在当地搞起了副业生产，不仅烧窑，还开起了暖房孵化小鸭小鸡。“父亲很有经济头脑，他亲自带着村民坐火车去东北销售孵出来的小鸭小鸡。因为他敢干，当时陈村算是那个区域比较富裕的村子。”

除了真抓实干，带领村民摆脱贫穷，陈广诚还经常用自己的工资和粮票助人为乐。“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父亲却把发下来的粮食和工资，资助学生们或者有困难的人。”陈建军还记得当年父亲帮助过的一名贫困有志青年，后来成长为汶上县一名政法系统的法律专家。1962年、1963年左右，陈广诚家也不富裕，“父亲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袋子地瓜干，送到泰安，救了一个大爷一家的命。他们一直很感激我父亲，说‘要是没有广诚，我们这家人早饿死了’，那时候是困难时期。”

1980年2月，陈广诚办理了离休手续。不过，他还会经常去工厂、县武装部，以及学校，给老百姓和孩子们讲述革命传统。

最爱唱《保卫黄河》

陈建军说，父亲前几年没得病的时候还能骑着三轮车全城里转悠。在他的记忆里，陈广诚当年体质很好，两三米的小墙头，一跑就上去。因为经常跟着首长骑马，陈广诚还有一身好马术。不过，在陈建军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他很敬业，和我母亲、弟弟就在公社待着，剩下我和奶奶在家。有时候一个星期父亲骑着车子赶几里路回家一趟。”

陈广诚的哥哥陈广运，也是当兵的。“我祖母还去东北找过我大爷，当时首长说他手下有100多人，大爷说打完这一仗就回家探亲（老家是娶媳妇的意思），祖母就回来了。可大爷后来再无音讯。”陈建军感慨道：“我祖母刚开始甚至都不知道我大爷参加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后来省政府给烈士证的时候，才知道是共产党。”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记者提出给陈广诚老人拍照，没想到老人非常讲究，执意起身，努力以最精神的姿态面对镜头，面露微笑。从老人身上，记者看到了一名军人身上的严谨和威严。

陈建军告诉我们，父亲最爱唱《保卫黄河》。他起个头，老人就会跟着哼唱。有时候也会跟着陈建军一起喊“一二一”的口号。他虽然吐字模糊，但神气十足。

亲纪氏极力反对：“当初供你上学，指望你以后能升官发财。不料你却是个败家子！凭着正路不走，偏要去闹共产。家里为了救你，卖了三百多亩地。你看，你把家弄成什么样子了？难道你觉得咱这点家产来得容易吗？”

陈耀贤也毫不让步地说：“一个人不能光为自己。为了自己去剥削人、压迫人是可耻的。天下的土地，本来就不是哪一个人的。世界上的人，不管穷人、富人都有一份，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觉得一切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才是真正的败家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才是真正的不走正路。至于谓共产共妻，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宣传。”

陈耀贤继续说道：“你们念母子之情，不避风险，不辞劳苦，花钱救了我，我终生不忘。可是，你们为救我一个人舍得把那么多钱拱手送给张苇村，却不舍得给我很少的钱办学。去救救很多很多的穷人，这真使我不明白。”从此，陈耀贤便决然离开家庭，又回到济南。

1934年，陈耀贤与徐智雨、丁梦孙、丁适存、翁运庆、汪汝琪、陈传刚等人，在济南贡院墙北路文艺社，出版《一线》刊物。丁适存曾回忆道：“陈耀贤是有一团火球般的革命热情的青年。在我们中间，他的理论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文章很可观，宣传文章多出自他手中。”

1936年1月，在众鸣文艺社的基础上，陈耀贤与丁梦孙、汪汝琪、陈传刚、高凌久等人秘密组织“抗日反蒋同盟”。同年5月1日，国民党山东省军法处派出军警特务，逮捕了丁梦孙、郑汀云等17人。陈耀贤因通讯地址与住处不在一起，幸免于难。

1936年5月，陈耀贤在上海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元旦，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陈耀贤分乘共产党员丁适存去上海北站。为了安全，他们分乘两辆黄包车，途中遭遇特务跟踪。为了掩护战友，陈耀贤只身引特务到巷口。好在有惊无险，他顺利地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不久后回到济南。

1937年4月，陈耀贤在济南再次历险。“李景仁夫妇从济南回来告诉我奶奶：俺五哥在济南又办了个家事。一天，两个带枪的来找五哥，正巧五哥不在家。晚上五哥回来，看门的一说白天的事，五哥连门都没有进，转身就走了。”陈一章说道。

1938年大年初一，日军扫荡华岩寺村。“因为有人告诉鬼子：陈耀贤是个大共产党。鬼子放火烧了我们的家房子。大火一昼夜不灭，没人敢救。从此，奶奶与家人逃亡在外。很可惜，连张爷爷的照片都没留下。”陈一章说道。

“奶奶与家人在逃亡期间，一直打听爷爷的下落。当时探听的消息是在新四军，后来又听说在武汉。”陈一章说道。

“1938年台儿庄之战后，爷爷从上海给家中寄来一信。信中说：家乡一起战事，我就知道没有家了。现我正准备人马带兵打仗，家中也不要回信了。”陈一章说，这是爷爷陈耀贤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

去救很多很多的穷人

1933年10月，陈耀贤与人合伙开办了一个“三宜斋”果子铺，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母亲纪氏对此不能理解，嫌陈耀贤没有出息，要求他回老家。陈耀贤的回答是：“我要趁年轻干事业。”

“1934年8月，爷爷与奶奶一起从济南回到老家。9月，我的父亲出生了，爷爷仍不在家。”陈一章介绍道。

这样不顾家的行为，愈演愈烈。一次，陈耀贤与妻子商量：“我要把地都卖了，只留30亩够你们娘俩用的，在凤凰山前盖一所大学堂。”为此，母